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意涵〔*〕

张淑娟^{1,2}

(1.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2. 中国矿业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中华民族源于远古,“中华民族”符号形成于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于当下,古代、近代与当代形成连续的历史脉络,勾勒出对中华民族本体认知不断深入的基本过程,既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背景与渊源,也推动其三重意涵渐次生成:历史基因浸润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者密切相关同时又各有特点,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貌。其中以现代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多重意涵的内核与灵魂。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的层次性和相互关联性,既能避免思想上的混乱,又能为当下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理论基础,也是进一步探索其培育路径的前提。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国家;统一战线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1.007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相关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也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一方面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华民族”从词汇提出到发展、演变直至概念形成、内涵确立、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也从实践上就如何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有益的探索。民族学界有力回应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对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动员力的理论需要。但笔者注意到,与民族国家政治内涵相一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和衍生自历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统战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有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又存在不完全一致的方面,既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又有溢出或被整合的部分,厘清这种不一致产生的政治和情感基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华民族在演进中的历史积淀为基础,以“中华民族”符号提出的时代需要为重点,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作为落脚点,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意涵,作为对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的

作者简介:张淑娟,法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民族理论。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互动研究”(项目编号:16BMZ003)、2018年辽宁省创新人才项目、2019年国家民委“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开放课题”(项目编号:A2019JD02)的阶段性成果。

一种探索,并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相关议题不应仅仅限于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学界。

一、历史基因浸润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近代中国按照西方民族国家衍生的逻辑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王朝国家的演进逻辑被西方国家的入侵所打断,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过程,似乎王朝国家并未对民族国家的构建产生实质性影响,事实上,不能高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断裂”与“缝隙”,“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1]王朝国家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产,孕育了民族国家的部分要素,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础。长时段观察中国历史,从秦统一直到清王朝整个历史时期都是王朝国家时期,概括起来几千年的王朝国家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主要包括疆域、人口、政治经验、传统文化等几个方面。

第一是疆域。自秦以降,中国的疆域一直以中原为中心不断扩大,直至清王朝时期基本确定下来,“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广阔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2]就历史上的中国,谭其骧先生曾谈到:“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3]那时的疆域构成了历史上的中国的合法区域,在此区域内的民族与民族政权都属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政权。随着西方国家的侵略日甚一日,以那时的疆域为基础逐渐形成主权国家观念和外交原则,中国近代外交也逐渐形成。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自然基础,也是封建王朝最大的政治遗产,成为构建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是与疆域扩展和最终确定相一致的人口。一方面人口是重要的社会发展条件,人口的质量和数量会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因

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其统治时期的人口状况。统治者关注人口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人们背后的土地,对疆域的关注使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口转变为重要的政治因素,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行动使特定祖先的领土与人们的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实现集体“记忆领土化”,进而形成祖国观念,祖国为人们提供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安全,而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第三是对特定疆域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经验。一方面是始于秦统治时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人主中原”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是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张,形成了以华夏族(后为汉族)为核心的对周边族群的统治经验,形成“因俗而治”的政治统治思想。最新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中华民族世居中国,但其来源具有多元性特征,夏商周三代是华夏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阶段。后续几千年发展的历程是以中原为核心地域不断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汉族族体的不断扩大相伴随,随着汉族生活区域的扩大,不断将其他族体吸纳进来,也不断向其他民族聚居区域渗透,并与其他民族交往融合,逐渐勾连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最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4]“多元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实体的结构性特征。与上述民族网络发展相一致,中华民族的生活区域逐渐固定下来。根据郝时远先生考证,在古代中国“族”的概念在先秦文献中就频繁使用,后逐渐获得了分类学特性,开始在不同层面成为区分不同群类的概念,如将“诸夏”视为同族,而蛮夷戎狄为“他族”等等,并根据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程度的不同,将统治区域分成:“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所谓“五服”,据相关的“族类”记载:“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

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背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5]继续扩展的结果是中华帝国逐渐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中国世界秩序的特点之一是优越性和层次关系。它不是领土主权国家组成,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帝国。它的组成一方面作为中央权力的中国,占着以文化优势为基础的优越地位;而另一方面是附属成员国,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从属中央权力。中国从而被称为‘中央大国’,并在精神的意义上包括全部宇宙,称为‘天下’,而这个世界秩序的其他成员被视为臣民,其间关系是不平等的,所有愿与中国发生接触的国家必须是顺从的、服从的。它们必须接受自己的低卑地位和‘中央王国’的优越地位。”^[6]

第四,以中原为核心不断扩展的结果是形成由近及远的族属关系。这种族属关系在文化上有鲜明的特征,一种是鲜明的“种属”和族界观,一种是以“文化”作为进退的标准,在不同的历史形势下侧重点会有不同,亦或兼而有之。就中国传统族属文化的这一特征日本学者佐藤慎一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华夷观”即是汉族将自身的生活方式体系视为文明,而将与之不同的异民族的生活方式视为非文明而产生的世界观。但是,“汉族/异民族”这一种族性的基轴与“文明/非文明”这一文明性的基轴未必经常一致。如果将重视族性的方面称为“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将重视文明性的方面称为“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的话,根据强调重点的不同,“华夷观”对现实社会所起的作用不同:重视“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时,如概言“非我族类必异”所表现的,即作为排斥异民族的理论而起作用的倾向较强;相反,重视“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时,“如夷狄变为中国,则以中国视之”(韩愈)所表现的,即使是异民族,只要满足一定的文化条

件,就为中华帝国所容纳。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两个方面都有所呈现。^[7]总体上看,“大一统”“天下观念”成为不断滋养并消解“族类”观念的文化土壤,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自在”向“自为”历史性转变的深层次文化基因,成为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与上述疆域、人口、政治经验等因素相一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华民族自带光芒,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土地积累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丰富的传统文化浸润着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传统文化沉淀成稳定的文化基因融入人们的血液里,形成历史基因和文化密码。中国传统文化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现代国家提供了所需要的思想素材。另外,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升华成海外华侨华人寻根访祖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故土的深深眷恋不一定与当下的社会发展直接相关,但是一定与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连。

现代民族国家与历史的密切关联就连民族主义的现代主义学派也不能否认:对历史上形成的领土的继承……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8]王朝国家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领土、人口、文化等重要的政治遗产,一方面为民族国家的构建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最为深厚的文化基础,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会沉淀成历史基因,形成历史惯性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也为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政治选择提供基本素材。总之,经过几千年发展的中华民族处于“自在”阶段,还未完成自我体认,但为走向“自为”准备了条件。

二、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近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转型期,民族国家的构建既包含对王朝国家历史遗产的肯定和保护的一面,也包含面对西方全新的政治理念对历史传统摒弃的一面。既有理论努力,又有实践探索,实践探索是理论努力

的基础,理论努力又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实践的缺位,二者共同推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整个过程,近代社会各种进步力量为保全国家领土、主权独立付出巨大的实践努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条件。

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一方面要在观念上实现从天下到民族国家^[9]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上构建民族国家,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一件“紧身衣”,在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同时防止国家走向分裂,并为民族国家的创建提供象征性符号。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强烈的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思想相契合形成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承担起这一使命,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凝聚,各种社会力量顺应形势需要,最终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对“中华民族”与国家构建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个近代历史过程,争论的最终共识是:中华民族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文化意义上中华民族被赋予丰富的政治内涵,为国家构建提供象征性符号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使命,也是随后对相关议题展开讨论的逻辑基础。

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民族国家构建这一历史过程共生,作为王权与封建统治相对抗的力量出现,在产生之初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伴而行,^[10]两者从不同角度为现代国家的创建提供支撑,自由主义为国家建设提供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程序,民族主义则强化国家认同和精神归属,提供整体框架和边界原则,更强调范围、界限与边界。统一市场、民主政治框架、文化同质、国际政治中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丛林法则”等等都是西方经典民族主义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因此,经典民族主义的理论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1)民族是人类自然而神圣的群体划分,对民族的认同和忠诚至高无上;(2)每一个民族都应是一独立的政治单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人类幸福安宁的保障。”^[11]一方面,西方民

族国家话语体系下,民族与政治建立了联系。“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12]现实是民族的边界和国家的边界很难达成一致,正是这些事实的不一致造成了“人类所经历的所有弊病——压迫、疏离和精神枯竭”。^[13]因此,民族主义的现代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提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4]这实际上表明在西方世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经典意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二是通过国家整合和“民族建设”来“创造民族”,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承认并不是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和边界才是民族活动的舞台和边界的“切割器”。

虽然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相对贫乏,但并不妨碍它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民族国家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增生,民族国家模式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近代中国在遭遇侵略的同时,与民族国家思想相伴随的一系列观念传入中国,这些全新的词汇对中国传统认知体系和政治经验提出挑战,出现了激烈的思想交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端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合流,并经历了缓慢的生成过程”。^[15]《万国公法》的引入、《天演论》的翻译、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等几个关键性外来要素与西方国家不断侵略的事实不断涤荡和消解中国传统族属^[16]观念,随着中国半殖民化程度不断加深,以清王朝疆域为限,内部的族界和种属观念逐渐淡化,外部的天下观念逐渐向国家观转变。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具有鲜明的种族革命的色彩,“革命派的‘满洲人非中华’的主张,事实上不仅否定了中华国家的连续性,即中华王朝的法统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也否定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连续性。”^[17]因此,注定了只能是插曲。虽然近代中

国民族主义具有鲜明的层次性,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主义成为形成合力的重要工具,各种方案都要让位于对清疆域的继承。以清疆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继承,也就构成了中华一体观念的连续性,这一思想一脉相承,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以政治统一为基础的中华民族思想逐渐形成。

也要看到,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就如它在西方世界呈现的一样有两层含义,不是如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只有政治内涵。梁启超、孙中山、汪精卫都受到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文章中都有关于民族构成要素的讨论,这些要素显然不是构成“nation”的必然要素,同时他们对中国多民族情况都有清醒的认知,因此,笔者更愿意将他们对“nation”的单方面强调看成是一种选择。为了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梁启超提出了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8]孙中山也提出“小中华民族”和“大中华民族”,最终“中华民族”上升为各民族总称,成为与国家边界相对应的现代民族符号,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思想形成相一致,新史学研究迅速展开,各类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不断创办,中国历史地理沿革得到重视,民族、国民、种族的讨论渐次展开,民族振兴与民族复兴思想兴起。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中华民族划定了边界,“中华民族”现代民族符号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整合加工,将其纳入到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框架之中。在此之后,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国家代表并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自然发展,在近代经过淬炼和升华,被赋予多重含义,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团结抗战的时代旗帜,“早已超越了普通的‘民族’范畴,而是形成了一个集政

治、经济、文化和情感联系于一身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1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确立。

“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观念相伴而生、同步形成,各种社会力量持续推进、互动融合,最终使“中华民族”成为与国家疆域相一致的象征性符号,“中华民族”赋予国家以民族属性,“中华民族”=“全体国民”,以此为基础的共同体观念为现代国家的创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国家得以以全体国民之名进入政治竞技场。同时,现代统一主权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和保障。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随的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既有合作又有较量的政治过程,合作使以广泛的爱国主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较量则是与资源分配原则密切相关的政治实践,“最终把革命与造反、王朝更迭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是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变迁。”^[20]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与国民党进行军事上的斗争,另一方面,在农村进行广泛深入的土地改革,这一改革运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实质性扩张,重塑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结构,发明了种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21]实现了社会结构实质性变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向下一阶段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获得了基本的政治框架和稳定的想象空间,具有了国家形式。”^[22]中华民族的边界与国家疆域的边界相一致,即全体国民的政治意涵,中华民族此种政治意涵在费孝通先生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中再次被肯定:“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2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中,“中华民族”是“一”,各民族是“多”,因此,各民族的各自认同、对其他民族的认同及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虽层次不同,但相互支撑,融为整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也“中华民族”词条解释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分布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省。包括56个民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24]

2014年,习近平在接见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少数民族界委员时提出了“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2015年8月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在原来“四个认同”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习近平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5]以现代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多重意涵的内核与灵魂,正是以这一意涵为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质是“民族建设”的思想层面,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一方面,也是其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

三、统一战线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发展与超越,它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又超越共同体,基于阶级联合又超越阶级联合,使中华民族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内涵更加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广泛的号召力。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是从民族工作和民族学领域提出的,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经过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加之中国共产党不断的理论创新和丰富的政治实践,使得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统战工作提供理论支撑、目标和实践指向,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的

实际工作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也扩展了它的外延。

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联合的高度重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民族问题上进行任何一种简单化的处理,他们充分肯定无产阶级将自己组织成民族的重要意义,“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26]他们同时认为民族国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借助的重要的国家形式。毛泽东也谈到:“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7]“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28]这是马克思主义在阶级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上的辩证法。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政党、党派、团体之间为了共同体利益的协调与合作,“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反对主要敌人,实现自己的战略任务,同其他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等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的政治联盟。”^[29]中国共产党素有统一战线的传统,统一战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弱变强,从革命到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时代课题,统战对象亦不断调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时间是1924年到1927年,主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时间是1927年到1937年,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间是1937年到1945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1945年到1949年,目标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文革结束后,在国际上逐渐放弃将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友的做法,国家利益逐渐成为衡量外交工作的唯一标准。与国际领域的转变相一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革命的历史叙事逐渐被现代化历史叙事所取代。”^[30]因此,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爱国统一战线”,终结了“革命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突出“共同体”特征,爱国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31]“指明了统一战线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阶级’和‘阶级联合’,而是立足共同体认同的‘爱国者’,阶级分析基础上的‘劳动者’与共同体视角中的‘爱国者’被紧密整合在一起。”^[32]进入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更加重大,主要任务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33]因此,统战的对象也空前广泛,包括“(一)民主党派成员;(二)无党派人士;(三)党外知识分子;(四)少数民族人士;(五)宗教界人士;(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九)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十)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十一)华侨、归侨及侨眷;(十二)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34]今天,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

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35]习近平在2015年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上将统一战线的重要功能概括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36]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不断向四周延展的共同体,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集聚更多力量。

首先,统一战线从历史角度还原中华民族的丰富内涵。从中华民族这一词汇提出和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在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不仅是各民族的统称,也是不同阶级、阶层和政党的集合和总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37]只是长期以来几乎只在民族工作和民族学领域提出这一命题,一提到“中华民族”就认为她是56个民族的统称,并仅将56个民族当成中华民族内在结构的支点,这样一种转变将本该丰富的中华民族内涵单一化,同时造成其结构单一化,限制中华民族的社会基础,也直接影响其社会动员的范围和效果。实际上,将不同阶级、阶层和政党纳入到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中来不但不会造成矛盾,反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和动员功能相一致,也与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相契合,并使中华民族这一实体获得更多支点,使中华民族作为实体真正“实”起来,更加立体丰满,从某种意义上解决“民族”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统战工作的视域之下恰恰能弥补上述工作的不足,还能更加有效地凝聚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 and 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其次,统战工作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

地发挥凝聚人心的重要功能。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给予各民族充分的自治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叙述框架正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工作的积极肯定,也是对各民族的制度安排在理论上的肯定。但是,如何在中华民族框架下安置 64 万多未识别民族?^[38] 如何界定加入中国籍的 0.15 万外裔人士?^[39] 如果在中华民族框架中不能合理解释这些问题,以此为基础并衍生于中华民族的一系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会受到质疑,如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等。因此,不妨回到民族国家框架下,从“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的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将“人”作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最基本元素,将“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别称或另一种构成。统一战线是“最大的政治”,核心是争取人心,统战的对象也恰恰是“人”,统战工作在某些方面能弥补民族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发挥凝聚人心的重要功能。

再次,统战工作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于统领海外统战工作,更好地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进程中的推动作用,这样,新时代的统战工作目标才能落到实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流迁已是大势所趋,海外统战工作更显重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海外统战工作中重要功能的发挥,一方面得益于经过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已形成寻根访祖、关注民族命运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来自新中国成立 70 年中国国力日益强盛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中央政府及派出机构对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利益的切实关切。

四、小 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本体的认知和反映,也是古今结合、内外相交的产物。中华民族从历史中走来,经过复杂的历史过程为

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得到升华和淬炼,“中华民族”现代民族符号的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获得国家形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共产党处理阶级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间张力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战工作提供理论支撑、目标和实践指向,统战工作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从历史角度恢复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内涵,使中华民族的社会基础更加扎实,同时扩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海外影响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意涵在理论逻辑上紧密相连,在实践逻辑上相辅相成形成整体。从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词汇,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成为政治符号,再到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新的认识领域提出,反映了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如何从新词汇、从文化符号转变为政治符号,又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语义的回归与扩展。不同的时代会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内容和指向。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再次被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并入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丰富的意涵,其中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核心与灵魂。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要紧紧围绕核心与灵魂,防止泛泛之谈,同时也要防止过于狭隘理解,限制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社会基础。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涵的层次性和范围也有利于在实践层面探索具体的培育途径和培育方法。此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重意涵正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从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学领域提出,但不应仅仅局限于此的钥匙。

注释:

[1]周平:《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报告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2-109页。

[2][4][2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3]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5] 陈澧注：《礼记集说》卷3《王制》，《四书五经》中册（影印本），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88年，第74页。

[6] 王铁崖：《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转引自[美] 惠顿：《万国公法》，丁魁良译，何勤华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

[7] 参见[日]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杜赞奇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复线”理论，认为在历史上“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族际意识形态交替出现。参见[美]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8] 参见[英] 安东尼·D. 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9] “多民族国家是按国家的民族成分或民族构成状况划分出来和界定的一种国家类型，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却不是按同一标准划定和界定的国家类型。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或阶段，其本质是实现和保障与国家(state)结合在一起的民族(nation)认同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某个民族国家内的民族成分是多样化的或趋向于多样化，它也可以从民族构成的角度界定为多民族国家。……总而言之，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是以不同标准划定和界定的国家类型，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对子，用一个国家的民族构成去否定它的民族国家性质，是不恰当的。”参见周平：《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

[10] 塞顿-沃特森就指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曾是同一事业。”Hugh Seton-Watson, *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7, p. 443.

[11] 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12]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3] [英] 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四版导言，第7、8页。

[14]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15] 张淑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生成与外来关键性因素》，《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16] 中国传统的族属观念有两种：一是基于生物学意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是基于文化意义的“如夷狄变为中

国，则以中国视之”。

[17] 王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1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3），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5页。

[19] 王希恩：《再倡“多元一体主义”》，《学术界》2018年第8期。

[20] 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6-95页。

[21] 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导言第1页。

[22] 张淑娟：《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回溯》，《学术界》2019年第9期。

[24]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9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25] 《习近平：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http://www.zyztb.gov.cn/tzb2010/xzgzzh/zydlcxgzzh.shtml, 2019-12-27。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27]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1页。

[28]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9页。

[29] 蒋建农、肖杰：《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30] 张淑娟：《批判与反思：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再认识》，《学术界》2016年第12期。

[3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7页。

[32] 张艳娥：《在阶级联合与共同体之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双重属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33][34][3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5月18日。

[36] 习近平：《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5月21日。

[37]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95页。

[38][39]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256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